

军事指挥军官院校教育问题思考

李孟军, 邓宏钟, 豆亚杰, 杨志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要: 本文分析我军体制改革前后军官能力素质结构的需求变化, 从军官院校教育人才培养的内容、培养对象、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依托军队院校并与军种、战区联合开展军官院校教育, 发挥院校的知识理论教育优势与军种、战区在实践能力培养、问题研究方面的优势, 以适应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知识、素质、能力培养要求。

关键词: 军队改革; 联合作战军事人才; 军官院校教育; 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 E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7)02-0010-05

A Study on the Academic Education for Officers in a New Military Organization System

LI Meng-jun, DENG Hong-zhong, DOU Ya-jie, YANG Zhi-wei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quality requirement of officers according to the military reformation, to aim at the problem of academic education for officer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measures for the content, the optional personnel and the education mode.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military academies should be supported by military specialty and theatre of operations, so as to take advantage of military academies in knowledge educating, military specialty and theatre of operations in operations-capability-building and problem-investigating. Thi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atisfy the demand of being joint-operations commanders in knowledge, quality and capability.

Key words: military reformation; joint operations military personnel; academic education for officers; education mode

一、引言

为了适应新时期国际国内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顺应武器装备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军进行了新一轮军队编制体制改革。这次前所未有的改革, 以“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为总的原则, 重构了我军的作战指挥体系, 形成了战区职能和军种职能分工清晰而又紧密关联的矩阵型领

导指挥体系^[1]。分工清晰是指战区职能重点关注作战资源的联合运用, 军种职能重点关注军种资源的专业化高效提供。紧密关联是指二者使用相同的作战资源, 战区的兵力运用以军种的兵力提供为基础, 同时又根据作战需要为军种的兵力配备、训练提出要求并提供指导。

这种矩阵型组织结构有利于强化军委统一领导, 也有利于联合作战指挥机关聚焦作战对象、作战环境和作战资源的有效利用, 同时有利于适

应新时期高技术武器装备对军事训练专业化的要求^[2]。新的编制体制下，多军种联合作战人才对新的机制顺利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习主席指出，要采取超常措施，多管齐下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尽快有一个大的突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新的领导指挥体系“平战一体、常态运行、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改革目标^[3]。新的编制体制对军队人才队伍的知识、能力、素质有哪些新的需求？现有军事指挥人才能否适应新的体制、能否满足联合作战岗位需求？随着军事变革的发展和人才需求的变化，军队院校、军种、战区在军官院校教育方面应当承担哪些职责？这些问题是军队院校服务军队改革转型首先应当作的研究工作，也值得军队人力资源部门重视。

二、传统体制环境下军事指挥军官能力特点

传统体制下，军种之间的协调配合主要通过顶级高层指挥人员之间的协调配合，对于下级军事指挥军官而言，与其他军种协调配合的工作并不多，平时的训练管理环境与作战环境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其主要特点如下：

1. 使命任务单一。传统体制下，各军种的任务界限清晰，对全局任务的把握由上级特别是高层指挥人员完成，而处于作战指挥环节的军官，其任务目标是完成上级规定的军种内本级任务，不需要考虑全军协调问题。

2. 作战资源运用协调需求少。在传统的体制下，作战资源的运用局限于单一军种的范围之内，军种之间的配合由军种的高层进行协调，处于单一军种中下层指挥岗位军官不能直接获得其他相关军种的作战资源，也很少直接为其他军种提供支持，对其他军种的作战资源缺乏相应的知识，只有高层指挥才具备多军种协调能力。

3. 上下级以垂直指挥与沟通为主。由于传统军事组织的效率要求，组织设计和运行机制中力求指挥通道清晰，以避免多头领导、横向干扰，因此，各级组织内部界限清晰，各级军官处于严格的层级组织树形结构之中，强调上下级垂直方向指挥权力运用，即使是下属作战单元横向协调，很多情况下也需要通过上级干预。

很显然，在传统体制下，军官平时训练管理养成的能力、素质以及积累的军种资源的相关知

识都在军种范围内，这种体制下，多军种协同作战需要从上层绕行，指挥路径长，高层任务繁重，反应速度慢。多军种协调配合能力较弱，很难完全适应军改后新型机制的运行环境。现有军官队伍基础上存在的这些问题，为新体制的顺畅运行带来了障碍，这些障碍消除，必须依赖于新型人才的培养和现有军官队伍的能力更新。

三、军改后新的运行机制对军事指挥军官能力素质的新需求

从形式上说，军种与战区构成的矩阵型组织结构中，尽管建设管理职能与作战指挥职能存在清晰分工，但是，无论是作战还是建设管理，各级军事指挥员所使用的作战资源是相同的，指挥军官既处于军种内部的指挥节点，也处于战区联合作战指挥网络的节点，这就要求在平时军队建设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军种自身的作战能力发挥，还应当考虑与其他军种的联合作战需求，需要军事指挥员既能够协调本军种内部的上下级与平级作战资源、又能够协调其他军种的作战资源。这种联合作战协调机制如图1所示。

新的机制下，除了原有的军种高层次统一协调之外，还存在不同军种各级指挥军官之间的紧密协调配合，需要在利用军种作战资源的前提下形成联合指挥能力、联合行动能力、联合保障能力^[4]，这对各级军事指挥员的知识、能力与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1. 需要熟悉其他军种作战资源的知识。作战需求决定了对军种中的各级军官的联合作战指挥能力要求，军事指挥员处于战区联合作战指挥网络的节点，不仅需要熟悉本军种内作战资源的性能与运用，还需要了解其他军种武器装备性能、指挥运用的方法。

2. 需要具备与其他军种横向协调联合作战的能力。战区联合作战环境下，各军种的有机结合能够有效提高作战资源的运用效率，军种的协调应当是作战资源在战场环境下的有机融合，需要突破传统的纵向指挥机制的限制，各军种单元紧密横向协同，建立一种基于作战环境的多军种网络化联合作战机制，这就要求处于作战指挥节点的军事指挥人员具备联合作战的横向协作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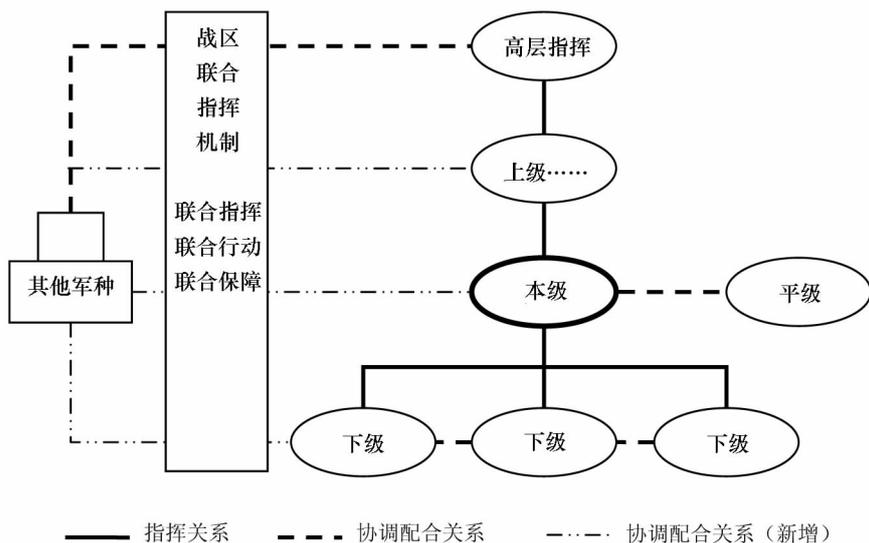


图1 新型体制下的战区联合作战军事指挥与协调关系

3. 需要具备网络化联合作战组织结构下的信息能力。对于现代战场的复杂环境,战场的空间覆盖面广,战场态势复杂多变,多军种联合作战效果也时刻影响战场指挥决策,军事指挥员需要具备战场信息收集、识别、分发与处理能力,以利于联合作战的指挥协调。

从习惯的传统单一军种纵向指挥机制,转向相对陌生的矩阵型指挥体制,新机制下的多军种资源协调运用与相互支援,对联合作战指挥者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从军种主建的角度来看,现有的军事指挥人才在能力上能够满足军种内的训练指挥,但是难以满足联合作战的训练管理模式与要求,如果军种的人才供应情况得不到改善,依赖于军种人才资源的联合作战就成了无源之水,战区主战的职能难以真正实现。

四、新体制下军事指挥军官院校教育的关键问题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应该是熟悉各军种作战资源、掌握联合作战指挥理论、具有联合作战指挥经验的新型人才,仅仅依赖于在部队建设过程中的训练不足以使我军中高级指挥军官快速适应联合作战环境,世界各国的中高级军官成长也很大程度上依靠军队院校在职培养这一主要途径。英、法、美等军队院校都承担对军官三个阶段的教育,即养成教育、任职教育和高级专业教育,前两个阶段是以基础教育和军种专业教育为主,第三阶

段的高级专业教育一般是在职教育,包含有联合作战知识教育与实践。美军95%以上的军官具有本科学历,将近40%的军官具有硕士、博士学位^[5]。为适应新的全球军事环境,我军也有必要根据新体制下的军事指挥人员知识、能力与素质要求,强化对现有军事指挥人员的院校教育。与军队院校生长干部培养模式不同,以联合作战为岗位目标的军官院校教育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军种知识和军事技能问题,而是联合作战的知识、素质和能力问题,仅仅依靠军事院校单一主体开展中高级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显然难以满足中高级指挥人才的培养要求,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针对中高级军事指挥军官的院校教育重要问题。

(一) 军事指挥军官院校教育的重点内容

根据军改后形成的矩阵型训练管理与作战机制对军事指挥人才能力素质的新需求,我军院校需要在三个方面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其能力与水平:

1. 军种作战资源的相关知识教育。需要结合实际提供多军种相关领域知识教育,使军事指挥员学习并能够熟悉与本军种紧密相关的其他军种作战资源的性能、应用效果。

2. 联合作战指挥协调能力培养。需要提供联合作战指挥理论教育,使军事指挥人员熟悉联合作战协调模式、研究协调规律、提高协调效率。

3. 联合作战信息能力培养。需要为军事指挥人才提供矩阵式网络组织结构下的信息收集、识别、分发与处理能力教育与培养,开展联合作战中的信息采集、处理、分发、运用等相关机制、

规律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教学。

（二）军事指挥军官院校教育的培养对象

目前新型军队管理和作战体制正处于转型过渡时期，各军种的各级指挥主官和参谋人员是未来战场的核心，都需要在原有能力素质基础上学习联合作战所必需的知识，提高能力、增强素质。但是，关键岗位的军事指挥人才的时间有限，军队院校和军种、战区的人才培养资源有限，院校教育的对象也应当慎重选择。从人才需求的迫切性和人才发展的角度，可以大致确定两类主要人员：

1. 旅、营级指挥员。组织机构扁平化是我军本次改革的一大趋势，未来战争中，旅、营一级军事指挥员是多军种联合作战的核心岗位，特别是素质优良的营级指挥员，具有较丰富的经验且脱离院校时间较长，其后续成长特别需要有联合作战指挥的理论知识和对其他军种作战资源运用知识的掌握，具有岗位的必要性和实践能力和学习研究动力。

2. 军种的军、旅级机关参谋人员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关参谋人员。参谋人员肩负着出谋划策的重任，是军事指挥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的延伸和协调工作的重要助手，特别需要联合作战指挥的理论知识和其他军种相关作战资源运用知识。

（三）军事指挥军官院校教育的培养模式

军官院校教育是一种脱岗在职培养的教育形式，其主要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的更新、深化和知识面的拓展，二是针对实际问题的学术研究，培养过程中既需要理论知识的教育培养，又需要实践环节的锻炼与研究能力的提升。

军队改革之后，军事指挥人才院校教育需要着重解决军事指挥人才的军种协调配合能力培养问题，在学员更新、深化单一军种军事指挥相关理论知识的同时，加强其他军种知识的拓展。因此，军官院校教育必然是一种依托院校的多军种合作、兼顾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的联合培养模式，拓展多军种武器装备知识，强化协调配合技能技巧和信息能力，在读期间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联合作战方法与机制问题、训练管理中的联合事务管理、联合作战后勤、通讯、联合训练等等问题。

出于以上考虑，军官院校教育的培养模式应当是院校与军种联合培养的模式，具备以下环节：

1. 院校学习环节。主要学习军种武器装备知识、联合作战理论、军事学术研究方法，了解国

内外先进的联合作战技术和协调手段。

2. 跨军种与战区联合作战调研与实践环节。这一环节体现跨军种交叉资源的运用实践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实践，熟悉其他军种的运作方式，调研其他军种内部运行和联合作战协调问题并参与实践，特别需要整合联合作战指挥的理论知识和其他军种相关作战资源运用知识。

3. 研究环节。这一环节要求发现、分析并研究解决联合作战形式下的计划、指挥、协调、控制机制、活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多军种联合侦察与情报、联合作战指挥、联合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问題。

五、应对新型军事指挥人才院校教育的措施

由于我军历史上“大陆军”思想造成军队改革之前的军种隔离，各军种部队的军事训练和管理没有明确的联合作战需求，人才的能力素质储备主要面向军种内部。即使从新的体制上看，来源于主建单位的军事指挥人才，院校教育之前也具有比较明显的军种特征，然而，从面向实战的角度，战区在作战运用时客观上依赖军种人员结构，需要军事指挥人才具备多军种联合指挥协调能力以适应新增的军种间网络化横向协调配合需求。军种主建、战区主战的矩阵式组织结构，人才能力形成与能力需求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矛盾和隐患。

军队院校肩负着从我军广大军事指挥岗位培养联合作战核心骨干力量的重任，新的编制体制下，院校需要从传统的知识更新与知识深化型培养模式向扩大多军种知识和面向联合作战指挥协调能力培养的方向转化。因此，军队院校以及人才需求密切相关的各军种、战区需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适应新的形势。

1. 构建院校与军种部队、战区联合培养模式。显然，传统机制下的院校单独培养模式适合于单一军种知识的更新深化与能力提升，难以提供战区多军种联合作战所要求的多军种资源知识以及多军种协调能力。因此，需要从人才培养的宏观层次出发，构建一种院校与军种部队、战区相结合的联合培养模式，包含院校职能的确定、各军种与战区人才培养的职能定位、培养对象选拔与

使用等等。

2. 改革导师队伍结构。无论从多军种武器装备知识、联合作战实战经验方面来说,现有的院校导师体制难以适应新的人才培养需求,有必要提高院校导师的联合作战素养与实践经验,同时增加军种高级主官和具有较丰富经验的联合作战指挥官担任导师,既可以加强联合作战的实践性指导,又有利于作战部队与院校的知识共享与交流合作,这对促进院校基于实战的军事技术与军事学术研究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3. 培养方案制定。军事指挥人才培养中需要院校与军种、战区从宏观角度协调配合,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责,联合制定培养方案,使得人才培养整个过程得到各军种、战区资源的有效配合,提高军官院校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

4. 人才培养投入与基础设施建设。新的编制体制下,军官院校教育不仅涉及院校和人才来源部队、用人单位,而且涉及其他军种和战区,培养过程的需要在院校、军种部队和战区增加人才培养的资源投入。

在新旧体制转换期间人才能力与需求不匹配的形势下,面向联合作战军事指挥人才的军官院校教育是快速调整人才结构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有效机制,需要改变传统体制下将院校教育作为知

识更新和晋职晋级手段的观点,军事院校与军种、战区密切配合,培养联合作战各关键指挥节点上具有联合指挥能力的新型人才,提升其跨军种作战资源运用能力和跨军种作战指挥协调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在作战指挥时得心应手,从本质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人才的有效供给,确实落实“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原则下的联合作战矩阵结构优势。

参考文献:

- [1] 胡光正. 伟大改革的精髓——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J]. 国防, 2016(3): 4-10.
- [2] 李超. 中国历代军制演变及五大战区成立的意义[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6(6): 32-34.
- [3]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加快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视察军委联指中心时的重要讲话[J]. 求是, 2016(16): 5-8.
- [4] 薄建. 战区建设应树立三种观念[J]. 国防, 2016(6): 58-59.
- [5] 高辉, 朱建平. 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研究[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3(5): 113-115.

(责任编辑: 赵惠君)

(上接第9页)

- [3] 孙毅. 两代认知科学的水分岭——体验哲学寻释[J]. 宁夏社会科学, 2012(3): 116.
- [4] 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the Western Mind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497.
- [5] 王寅. 体验哲学: 一种新的哲学理论[J]. 哲学动态, 2003(7): 25.
- [6] 李小平.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占有与体验——后大众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困境及其超越[J]. 高等教育研究, 2017(2): 14.
- [7] 李小平. 关于院校研究方法的反思与创新[J]. 高等教育研究, 2007(9): 30.
- [8] 【英】乔纳森·格里斯. 研究方法的第一本书[M]. 孙冰洁, 王亮, 译. 长春: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2-3.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09.
- [10] 李小平. 院校研究的科学方法与教育智慧[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2): 125.
- [11] 【法】迪尔凯姆·E.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 狄玉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7, 13, 35, 51.
- [12] 杨治良, 叶阁蔚. 内隐学习“三高”特征的实验研究[J]. 心理科学, 1993(3): 34.
- [13] 【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 马月, 译. 北京: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1998: 5-7.
- [14] 李小平, 王晶晶. 军事教育活动的理论特征与比较借鉴的方法运用[J].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5(1): 42.

(责任编辑: 赵惠君)